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6.03.010

# 发现真实的乡村

## ——论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与权力书写

杨有楠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苦难与权力书写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仍以乡土大地上“世袭”的问题——苦难与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其对“疼痛的身体”的原生呈现,对反抗苦难的独特思考,对权力运作的个人反思,对乡村境况的极端化、粗鄙化摹写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乡土书写的格局,呈现出个人化的面貌。

**[关键词]** 阎连科; 乡土小说; 苦难; 权力; 个人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3-0049-07

### Discovering the Real Country

#### ——On Suffering Writing and Power Writing in Yan Lianke's Local Novels

YANG Younan

(Center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If we put Yan Lianke's local novels into the overall view of Chinese local writing, and find out his uniqueness of suffering writing and power writing through the way of close reading, it is easy to know that although Yan Lianke also takes suffering and power, which are the eternal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Chinese countries, as the major themes, his writing is sure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ocal writing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native rendering of "aching body", the unique pondering on the resistance of suffering, the personal rethinking of power operation, and the extremalization of country situation, the vulgar description, etc. To some extent, Yan's local novels have surpassed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ocal writing, and present a personalized look.

**Key words:** Yan Lianke; local novels; suffering; power; personalized

1990年代以来,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凭借日益丰盈的文本数量和渐趋鲜明的个人风格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目光。概而观之,研究者大都从主题内蕴、创作观念、语言形式等角度切入,以较为审慎、客观的态度剖析了阎连科的乡土书写,贡献了诸多研究实绩。这在为之后研究者铺平研究道路的同时,也带来了开拓创新的难度。但不容忽视的是,阎连科仍以旺盛的创作精力不断贡献出新的文本,这些文本在延续固有书写主题的同时,亦呈现出新

的质素,而这无疑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挖掘。此外,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阎连科成名之后的写作,对其早期乡村作品缺乏足够的观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研究缺憾。本文力图以较为客观的眼光对阎连科的乡土书写进行全面观照,并将其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考量,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挖掘其乡土书写的特殊性。整体而言,笔者认为阎连科的乡土书写有着较为明确的主题,一方面他竭力展示乡村生存的苦难境地以及

收稿日期: 2015-09-16

作者简介: 杨有楠(1989-),女,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个体生命的剧烈疼痛,并注意挖掘隐藏在苦难褶皱里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在酷烈地披露乡村权力内部结构的同时,也尽力将个人的反思揉入其中。可以说,借助对“苦难”与“权力”两大主题的细致挖掘和极端呈现,阎连科不但拒绝将乡村作为启蒙者的圣地,而且试图以粗鄙的乡村实相终结田园歌者的诗意想象,并最终达到发现真实乡村图景的书写目标。

阎连科对乡土苦难的揭示是通过发现“疼痛的身体”实现的。身体是人生首要前提,而生存之苦也通过身体的疼痛表现出来。在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中,身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疼痛”:

首先是食的匮乏。“五四”以来的乡土书写都致力于表现村庄的羸败带来的农民的贫穷与饥饿,这一传统的主题在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中呈现了新面貌。他不仅展现饥饿对身体的损害,也看到了食物对人的扭曲与异化。另外,阎连科对饥饿粗鄙、极端、精细的表现方式也使他的书写有别于以往的苦难书写。在“瑶沟系列”的小说中,作者大面积展现了乡村经济凋敝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食的匮乏。《情感狱》中全村奋战五年种的稻田,轻易地就在洪水中毁于一旦。饥饿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作为埋藏在国民心灵深处的阴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因而乡村人在食物贫乏的生存环境中,对吃衍生出的一种畸形的敬畏与贪恋。《情感狱》中有一段对连科第一次吃到白蒸馍时的细致描写,作者不吝笔墨地将一口馍入口后的过程详实地记录下来,读来实在让人心酸。《两程故里》中喜梅的丈夫苗大发将从食堂领的饭摔在了地上,看着可以维系两人生命的食物被自己毁掉,苗大发竟然自杀了。粮食俨然比生命更重要,人完全是为了粮食而活。食的匮乏不仅折磨人的身体,更扭曲人的精神,使农民成为被粮食物化的人,其主体性则淹没在对食的追求中。刘恒在《狗日的粮食》中也对这种粮食造成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披露,却更显深刻与震撼,其关键在于塑造了曹杏花这一为粮食生、为粮食死的人物形象:即使彪悍顽强如她,在本该稀松平常的食物面前也是如此不堪一击,其悲剧性与荒谬性也就凸显出来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阎连科对饥饿的描写越来越粗鄙、极端。在《日光流年》中,蝗灾过后,村民为了糊

口,在村长的带领下分粮食、吃蚂蚱、吃乌鸦,甚至人吃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为了使多数健全的孩子存活,残疾的孩子只能被牺牲。而在《四书》中,饥饿带来的又远不止是“吃人的盛宴”。在疯狂的集体炼钢和种粮后,九十九区陷入饥饿之中。一切生产活动都停滞了,育新者的日常活动全部都围绕着“吃”展开,如何获取可吃的东西成为叙事的焦点。育新者们为了对抗饥饿变得疯狂了:宗教践踏圣母画像、《圣经》,音乐出卖身体,作家背叛良知撰写《罪人录》,学者贩卖爱情……粮食没有了,吃人便开始了。最先吃人的两个人在吃饱以后就带着愧疚自杀了,然而在最后那场吃人的集体“宴席”上,原本救死扶伤的女医生却已经把吃人当作平常的事了。饥饿比死亡还要可怕,它一点点把道德良知销蚀殆尽,最后也把生命吞噬了。《日光流年》之后的小说对饥饿的书写更加直观且粗野了。《四书》里的音乐是个为粮食出卖身体却最终因粮食而死的女人,其被一把炒黄豆噎死的死亡场面简直要让读者呕吐了。她和李昂中篇小说《杀夫》里的阿母一样,都是这片荒原上的饥饿的女人。

其次是病的苦痛。早在“瑶沟系列”中,疾病就已经出场:《瑶沟的日头》中大姐的腰痛、《平平淡淡》中洪家老大和《黄金洞》中老二的傻病……慢慢地,疾病在作品中越来越密集地出现,其所带来的苦难也更加惨烈。从《日光流年》开始,疾病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借由想象在文本中获得了更高的意义,它不只作为事件推动故事,更具有了隐喻意义。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广泛的可能性”<sup>[1]</sup>。当疾病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即具有了可供猜测的多种可能性,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不可治愈性时,它的隐喻意义才得以彰显。《日光流年》中的喉堵病便是作者想象出来的具有此种隐喻功能的疾病,它在现实生活中是无详细考证的,几代三姓村人的尝试都源于对病因的猜测,由此故事才有了生发的可能。苦难的无端降临激发了人们的反抗意识,他们渴望活着,崇拜生命,因而不放弃任何一种可能,在对每一次反抗的具体描写中,作者剖析了人性,反思了乡村权力结构和现代文明,展示了真实的乡村。而喉堵病的不可治愈性则实现了对悲剧效果的传达,因为它规定了反抗结局的注定失败。虽然死亡不可避免,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显

示出来的“人”的力量却是有意义的。此外,五任村长带领村民反抗疾病的过程中都有时代的影子,而灵隐渠引来的现代污水也暗示了村庄遭受戕害的边缘性地位。《丁庄梦》里的“热病”同样具有隐喻意义。这首先来自于作者对其传播方式的描述和强调。丁庄人认为艾滋病是外国人、城里人和心性不正的人才会上,因而当艾滋病降临时他们起初是否认和自我宽慰,直到看到生命如灯灭、如枯叶般凋落时,他们才认识到染上了“热病”。艾滋病在丁庄的蔓延主要是通过血液的传染,而这源于村庄的致富梦,是一种物质性原因。原来的丁庄并不富裕却健康和乐,县教育局长因一己私利怂恿村民卖血,原本抗拒的丁庄人在看过别村的致富神话后也开始疯狂卖血了。苦难的滋生源于欲望,源于乡村在追求现代性中的贪婪,阎连科在其中表达了一种对村庄城镇化、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在《炸裂志》中作者又将其深化了。艾滋病在《丁庄梦》中的另一隐喻功能则是完成对人性的试炼。死亡的日益逼近暴露了人性恶的一面:丁辉为了聚敛金钱,建立私家血站,他欺骗村民;为压低成本,用一只抽血针为多个村民抽血;最后倒卖棺材,为死人配冥婚……丁水阳将患热病的人集中在村里的学校一起生活,没过多久,内部就出现了贼,紧接着病患上缴的大米袋子中多了压秤的石头和砖块。最后,离开学校的患者搜刮了校园,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真实的乡村并不只有田园牧歌,它复杂荒诞得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对死亡的恐惧也会唤醒个体生命对自我存在与价值的关注,丁亮和玲玲之间真挚又不顾一切的爱情为阴冷的丁庄涂上了一抹亮色,也在读者的心理留下了温暖的印记。

最后是性的折磨。不同于以往乡土文学中对性节制、含蓄、理性的表达,也不同于沈从文对性的诗意展现,阎连科笔下的性是极端细致且粗野的,他借此发现了乡土世界中疼痛的女性的身体。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是换取权力的筹码,是男性发泄欲望的对象,是生殖繁衍的工具,而唯独不是女性自己。她们处于底层的底层、苦难的中心,不但要忍受食的匮乏与病的苦痛,还要忍受掌权者的强行占有。《金莲,你好》里的金莲完全就是一个权力的祭品。拥有无限权力欲望的老二利用金莲对她的爱情谋求乡村权力,村干部们为了实现村改镇的政治梦想怂恿金莲去侍奉城里的李主任。然而半年后,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金莲回到的故乡时却受到

了人们的冷落,当初拒绝金莲的老二在实现了自己的权力目标后,也卸下伦理的面具,企图以金钱和恐吓占有金莲。自始至终,金莲都是弄权者手中的棋子,她对老二的爱情反而将她的生存变得更加窘迫。《日光流年》里的蓝四十也是如此。她爱着司马蓝,司马蓝却为了村长的位置而背叛爱情与杜竹翠结婚,还要求蓝四十去伺候掌握大权的卢主任,后来更下跪求蓝四十去城里卖淫赚钱供他做手术……爱情与性都不纯粹,而被塞满了太多人生的依赖与欲望,而女性的苦难就更深一层。《日光流年》中村长杜桑为与生命赛跑,鼓励村民多生育,女人必须忍受着无休无止的折磨,女性完全沦为繁衍的工具,而她们作为女性的尊严与欲望则被彻底地漠视。但其中的可悲性更在于女性对于自身苦难的不自知,她们将自我贬低到动物的位置,自认为生来只是为了完成生殖的使命,《坚硬如水》里的程桂芝就展现了典型农村妇女的性观念。久而久之,身体就变成了可以操控与利用的物,一开始是男人利用女人的身体追逐欲望,后来堕落为女人主动凭借身体操控男人。《炸裂志》里的朱颖等都是如此。为了完成对孔明亮的报复,朱颖把自己以及其他女性的身体都折磨得千疮百孔。她先是靠色情生意发了家,以村长的位子为筹码威胁孔明亮和自己结婚。后来她安排保姆小翠去破坏老大的婚姻,又以一场裸体的盛宴结束了公公孔东德的生命,最后更是以女子技校操控了整个炸裂的命运……身体成为了欲望的载体和追逐欲望的资本,完全成为物化的存在。同样,阎连科在描写女性身体时也是极端形下、赤裸的,非但不节制,更是肆无忌惮地敞开了写。在《炸裂志》中,小翠为孔明亮做裸体宴,身体则被作者细致地展现出来,然而它并不给人美的感受,反而让人觉得不适和恶心。阎连科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叛离了以往乡土写作中对身体的书写,也带给了读者不同的阅读体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其早期乡土小说中对女性的关怀与悲悯也一同消失了,为了对作者的个人观念和创作主旨负责,女人们放弃了个人尊严与欲望,逐渐将自我退回到被窥探与被消费的位置。

潘泽泉说:“对身体的运行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研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和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新的知识系统,重新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之间中那些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社会事实。”<sup>[2]</sup>阎连科执着于对身体苦难的展现,来源于其个人的乡村生活

经验,其目的就在于借此展现真实的乡土。而在以往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对苦难的阐释往往超越了具象的苦难承载者本身,而和抽象的国族苦难相连接”<sup>[3]</sup>。在鲁迅那些指向国民性批判的民族寓言里,苦难也是叙事的基础。虽然他也在作品里叙述了身体,然而这个身体却更多地是“一个精神化和隐喻化的身体”<sup>[4]</sup>。《药》中,革命者夏瑜试图以自己身体的牺牲来实现对老中华儿女们的精神启蒙,然而华小栓在喝了夏瑜的血后依旧未能逃过死亡。夏志清认为“两个青年的姓氏(华夏是中国的雅称),就代表了中国希望和绝望的两面”<sup>[5]</sup>,华的死亡象征着封建传统的没落,而夏的失败则表现了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悲观。因此,鲁迅对苦难还有身体的叙事是为了表达对国族的寓言。此外,阎连科的苦难叙事也不同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期间流行于农村题材中的苦难神圣化写作,作者并不将苦难作为人成长和精神升华的必要磨练,而是要借此挖掘乡村真相,拷问本质。阎连科说:“生命中的苦难在所难免,但那不是我着力表现的地方,也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而苦难中的某种精神才是我的用笔之所在,我以为,那种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是人类的希望之光。”<sup>[6]</sup>所以在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苦难以后,阎连科重点展现了苦难所激起的人的反抗。

反抗苦难在阎连科的笔下是逐渐深化的。在早期的“瑶沟系列”中,农民在苦难面前大多唯唯诺诺,即使反抗也仅限于地下式的。在《耙耧山脉》中,被欺凌的女性只敢在深夜对着村长的尸体发泄心中的仇恨。在随后的乡土小说中,阎连科开始塑造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先驱者。《耙耧天歌》中,在丈夫尤石头被吓得自杀后,尤四婆顽强地支撑下去,并且积极地为孩子寻求出路。《年月日》中的先爷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村庄的延续。《日光流年》里整个三姓村的村民在历届村长的带领下不计代价地与自然和命运持续抗衡,这样的群体反抗就更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意义。从在苦难面前的无力到敢于正视、抗击苦难,可以看出阎连科在寻求对苦难的超越与救赎,他渴望在极端的苦难中挖掘出埋藏在本质深处的生命韧性,试图以此实现乡村的自我救赎。然而他对现实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深知这种力量虽然珍贵却绝不足以帮助乡村摆脱困境。苦难在他的故事中是永劫轮回的存在,《年月日》中来年旱灾又一次袭来,象征着强大生命力和反抗精神的先爷死了,然而第二个先爷又在哪里?

《耙耧天歌》里尤四婆以自己的骨髓医治好了孩子,然而遗传疾病并未至此结束,苦难还在继续。《日光流年》里历任村长穷尽各种方法都不能改变村庄的命运,死亡还在继续……由此,作者执着于寻找人性闪光点,却并不奢望借其找到苦难的出口,为人类建造希望的神庙。这区别于乡土浪漫派的写作,作者不仅将村庄描写成苦难、粗鄙的炼狱,以此来区别于田园牧歌的诗意浪漫,而且又以田园童话的消失暗示了将其作为药方的不可靠性:原本仁义善良的马家峪村村民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也禁受不住诱惑了(《寻找土地》),茂盛的森林被一一摧毁殆尽(《丁庄梦》),亲兄弟不顾尸骨未寒的父亲为争夺家产而大打出手(《黑乌鸦》)……而在叙述层面,这种区别也十分明显。在多个故事中,作者首先都叙述了借回归乡土来逃离苦难的尝试,《日光流年》里生命回到原初找寻意义,受活庄的人退出机制隐藏到大山的更深处去了(《受活》),原名《回家》的《风雅颂》在结尾处也营造了一个远离尘嚣的“诗经古城”……然后作者又以苦难的永劫轮回宣告了“世外桃源”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了自己对乡土浪漫派写作的背离。但是作者的意图并不是消解反抗的意义。在《四书》最后一章的《新西绪弗神话》中,阎连科讲述了一个神话故事:为了惩罚西绪弗,神命其日复一日地滚石上山,慢慢地,西绪弗在惩罚中变得从适,而孩子的出现更往他无意义的滚复中注入了意义。神发现了他的秘密,于是施以新的处罚:滚石下山。突然的改变让西绪弗无所适从,他焦躁、不安,努力思考却没有答案。然而,时间的力量又让他适应了新的惩罚,也在山下的世俗风景里找到了新的意义。他害怕神再次改变他对处罚的从适和协调,于是学会了假装痛苦。而神终究没有发现这一切,西绪弗终于“静平从适,油然而自得”了。相较于反抗的结果,阎连科似乎更强调反抗这一动作本身,它虽然渺小得不足以让人脱离苦难,却可以让人在与苦难的抗争中滋生出哪怕一点点希望。当然,这并不能掩盖作者历史循环论的消极观念。

## 二

权力也是阎连科的苦难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权力书写与乡村苦难密切相关,但由于其较为复杂,所以选择将其列出并作单独论述。福柯曾指出“权力无所不在”<sup>[7]</sup>。权力也是阎连科发现

真实乡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同样与作者的乡村生活经验有关。他自小生活在农村的底层,因而对农村的政治结构和权力构成十分了解,他认为“中国的乡村政治完全被生活化,乡村生活完全被政治化了”<sup>[8]</sup>,因而他所关注的权力是民间生存层面的而非上层政治层面的。在书写权力时,阎连科仿佛有两副笔墨:

第一是书写无权者。阎连科刻画了在权力宰制下如狗般活着的无权者们,其中有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它区别于乡土启蒙派理性审视的视角,而是将个人的同情与悲悯隐藏在平实冷静的叙述下,这一方面使他的乡土批判带有不彻底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作品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自然与作者的个人身份有关,他对农民和土地的熟悉和理解使他站在理性批判立场上时总是小心翼翼,而1990年代以来农村在社会改革中的悲惨现实处境更让阎连科意识到仅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乡村是不够的。

首先,阎连科清晰地展现了权力压制下农民的生存境况。《天宫图》细致展现了路六命在权力网中无力挣扎的一生。十几岁时,他被掉下来的房梁砸断了左腿,在房主的儿子回村上任后,治病的事不了了之了,由此路六命落下了终生残疾。结婚时,他答应给妻子弟弟盖房子娶媳妇,却因为经济困难久久不能兑现。他指望帮村长守夜放哨凑钱却莫名其妙地被当作盗贼抓了起来。妻子以陪睡十次的代价请求村长花钱出力把路六命放出来。每次村长来家里找小竹时,路六命都要烧水让妻子洗澡,并为他们铺床放哨。村长心安理得,而路六命只能蹲在家门口,在床板的吱呀声中自我嘲骂。后来路六命为了金钱替人顶罪坐牢,并主动要求做最苦最累的活,拼命攒钱还给妻子。然而,提前出狱的他发现妻子早已用身体从村长那里换得金钱,回娘家帮弟弟盖房娶媳妇了。作者塑造的路六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农民,他善良、遵守诺言,但又隐忍、个性懦弱,而以村长为代表的强权拥有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主宰他的命运,不仅可以在经济上挤压,而且还在各个方面造成对路六命们的伤害。从经济到精神都赤贫如洗的路六命虽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甚至能发泄和报复的对象也只有他自己,除了自我嘲骂他所能做出的最大反抗就是“死”,可悲的是他的死就犹如灯灭叶落般微不足道,丝毫不能影响到掌权者的生活。但命运始终不

肯放过他,在美好的“天宫”转了一圈后,他又回到了权力笼罩下的乡村大地,磨难和屈辱还在继续。在这里,阎连科发现了生活在乡村权力宰制下的农民的悲惨处境:活着不若死去,想死却又不能得偿所愿。显然,阎连科在批判强权者的同时,也对犹如蝼蚁一般的农民表现出深刻的同情。

其次,阎连科揭示了无权者在乡村权力结构中被异化的一面。一方面,他们渴望权力。在展现农民追逐权力的血泪之路时,阎连科也对乡村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清晰的披露。“村长的权力源于他的父亲——老村长。”<sup>[9]</sup>这一语道破了乡村权力的衍生机制,即血缘。除此之外,婚姻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样,村里的掌权者利用血缘与婚姻织就了一张无形的权力网,实现了在乡村的专制统治。权力的这种衍生机制使得乡村世界根本毫无公平可言,弱小的底层农民只能如鱼肉般任掌权者宰割,若想要靠近权力中心,就必定拿尊严和人格换取,正如阎连科说:“乡村的婚姻是和爱情相分离的,大多婚姻之中,塞满了他们人生的依赖。”<sup>[10]</sup>《乡间故事》中,连科为获得权力追求村长的三女儿,然而村长却想把女儿嫁给可能要升官的副乡长的儿子,不甘心的连科则把爱情的诱饵投向了副乡长的女儿……然后权力就在这张巨网中继续延伸。《大校》中,握有物质分配权的队长让汪洋的父亲受尽了侮辱。后来,参军儿子汪洋和民兵连长的妹妹定了亲,支书是民兵连长的姐夫。父亲终于在队长面前找回了尊严,而队长则因为害怕自杀了。作者痛批了乡村权力结构的非正常与不合理,另外个人的主体性也在这样的权利机制中被抹杀了,所有的个人行动都必需服膺于集体的利益,久而久之,乡人就形成了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自我就被集体替代了。然而阎连科也认识到农民追逐权力更多是出于生存的物质性需要,“权力之所以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sup>[11]</sup>。权力的拥有者掌握着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在经济普遍凋敝的农村,这是尤其重要的。《情感狱》中的十八小队因“朝中无人”长期遭到不公正待遇,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全队人寄希望于连科,盼望着他能当上大队秘书。他们省下过年吃的白面,把四百斤返销粮送给书记;连科和队长三叔在寒冬为支书家的母猪接生;六叔情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支书瘸腿的儿子……因此作者在揭露农民对权力的渴望时,更多地是带着同情、怜悯甚至是认同的眼光,这就表现出不同于传

统乡土批判的情感态度。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乡村权力结构中,农民对权力的反抗与趋附都是畸形的。由于掌权者掌握着生存资源的分配权,因而农民都不敢轻易得罪村干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惧怕心理,然而面对强权的压迫,他们亦心生厌恶。阎连科曾说,中国农民是特别能忍的。即使到了忍无可忍必须发泄的时候,他们的反抗也是隐蔽式的。《情感狱》中队长三叔为支书家的母猪接生后,出于报复和不甘的心理,弄死了刚刚出生的三只小猪,但他向支书谎称是夭折。《耙耧山脉》中,所有的反抗都是在村长死后进行的,他们报复的对象也只是村长已无感觉的尸体,所谓的反抗也不针对权力本身,只能借转嫁仇恨来宣泄满腔的愤怒。除此之外,农民对强权的反抗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暴力和极端,这是权力对农民日常生活的极大扭曲。《三棒槌》里的石根子以充满仇恨的三棒槌打死了李莽,并在事后以预谋杀人的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丁庄梦》里的丁辉无恶不作,不但没有受到权力的制约,反而得到了权力的隐性支持,善良的父亲丁水阳不愿看儿子一错再错,只能亲手打死了丁辉,自己也锒铛入狱。权力宰制下的底层农民对权力的反抗只能以鲜血淋漓的方式进行,悲剧的是反抗的结果不是光明,却是更无边的黑暗。阎连科以作家的身份对社会和乡村体制作了深层反思,处于乡村政治格局最底层的劳苦人非但无法分享到社会法制化、现代化的成果,反而被推到了更深的苦痛里。但乡村权力体制对农民更大的异化则是对精神的奴化。《黑猪毛 白猪毛》描写的是生活在新世纪的阿Q的子孙们,甚至比之更加麻木愚昧。几个村民为了得到替村长蹲监的机会在李屠户的提议下抓阄,柱子“幸运”地抓到了黑猪毛,年近三十还没娶妻的根宝向根子磕头下跪换取这份“荣耀”。在他们看来,在权力网上结扣显然要比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来得重要。更可怕的是,这在乡村世界中是一种广泛的认知。在结尾处那场盛大又荒诞的欢送仪式中,乡民们对权力以及权力附属者的献媚得到了最好的表演。然而欧·亨利式的结尾出现了:死者的父母不要求镇长赔钱坐牢,只要镇长把死人的弟弟认作干儿子就行。乡土社会的权力竟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世界轻易就退回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作品的讽刺批判力度可见一斑,但又不到此为止。包括根宝在内的几个村民之所以愿意放弃尊严,是由于他们都有无法凭借一

己之力实现的愿望,根宝想通过对权力者的依附娶上媳妇,而事实上当根宝得到这个机会后他的愿望马上就跟着达成了。相较于农民,作者批判的更是乡村现实和乡村权力结构的不合理。并且阎连科在对根宝娘和爹的细致刻画中,挖掘出了人性的美好面,因此与乡村有着天然联系的阎连科是将自己的同情与悲悯揉入到批判中的。

第二是书写掌权者。在“瑶沟系列”中,掌权者大都是以压制性的力量出现的,他们克扣粮食,利用特权强行占有女性……阎连科以写实的笔法再现了掌权者对劳苦人的损害,这时掌权者们并不是权力书写中的主角,着墨也不多,他们存在于幕后,轻易地操控着农民的悲喜人生。而在“耙耧系列”中,掌权者一跃登上前台,成为故事的中心。如果说书写无权者参与了对农民真实境况的发现,那么书写掌权者则反思和质疑了乡村的权力体制,这是对真实乡土更深层次地展现。在这里,阎连科收起了批判又同情的写实笔法,换上了一副夸张、荒诞、漫画式的笔墨,所表现的情感态度则更多的是批判和讽刺。

《受活》中的受活庄原本是个自然原始的村落,它处在耙耧山脉的深处,不属于任何行政单位,虽然村里的人都是残疾人,但也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简直是同陶渊明的“桃花源”和沈从文的“湘西”一样的人间乐土。然而自从茅枝婆带领受活庄“入社”以后,自在村落受到政治灾难的破坏,由富足变得赤贫,由平静变得躁动,于是愧疚的茅枝婆试图让受活庄回到过去,重回原始状态。与此同时,权力狂人柳鹰雀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异想天开地要将列宁遗体购买回来发展县里的旅游经济。为了筹集“购列款”,柳鹰雀成立了残疾人艺术团,无所不用其极地聚敛钱财,于是原本残疾的受活人就更加伤痕累累了。表面上看来,是柳鹰雀强烈的权力欲望造成了受活庄的悲剧,他一方面想要成为共产主义的领袖,另一方面又想做“土皇帝”,让农民自觉地匍匐在他的脚下。他还是一个农民式的政治家,在他对权力无止境的追逐中,受活人的苦难不断加深。然而透过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柳鹰雀对权力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受他养父的影响。原本是孤儿的他被社校的柳老师收养,于是他自幼在社校长大、学习,是一个“社校娃”。因此可以说柳鹰雀是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是被社会主义教育学校培养

出来的权力人物,而养父为他设计的那张人生奋斗图表则更加激荡了他的权力欲望。阎连科将柳鹰雀塑造成一个漫画式的人物,不对他的性格面貌做细致的描写,而是尽可能地将其抽象为符号化的存在,为的就是突出其普遍性与必然性:柳鹰雀不是偶然出现的、具体的一个人,而是体制塑造出来的千千万万农村权势人物的缩影。同样,受活人又是在“入社”后遭遇不幸的,这样阎连科批判体制异化人的意图也就呼之欲出了,相较于欲望,作者在这里批判的更是体制。

权力更阉割了权力追逐者的人性,《坚硬如水》里的高爱军和夏红梅就是在疯狂的逐权之旅中消磨掉人性的人。表面上他们之间的爱情热烈又疯狂,然而通过细读即可以发现他们的爱与性皆来自于对权力的崇拜与向往。夏红梅看出高爱军是块革命的料,她向高爱军的献身也是对权力的匍匐;而高爱军也在夏红梅的奉承和阿谀中得到了幻想性的权力满足。对权力的狂热牵引出人性中的“恶魔性”,随之而来便是毁灭一切、控制一切的暴力欲望。无论是两人的疯狂性欲,不分昼夜地开挖地道,杀人,砸烧程家祠堂,还是结尾处惊世的性爱表演,都是在权力欲望的支配下完成的,人退回到原始的野蛮和冲动之中。然而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永不餍足的权力追逐者反被更高的权力吞噬,这场权力的游戏是无止境的,而消耗殆尽的人性却找不到回归的可能。

阎连科的权力书写,不仅展现出乡村和农民在权力之下的真实生活,也引起读者对乡村权力体制的质疑和反思。当乡村权力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而非在法制的保护中运行,这势必会让乡村更加困窘、积弱。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阎连科的方法似乎受到了道家的影响,那就是“无为”、去权力化。在《受活》的最后,受活庄在茅枝婆的带领下终于“退社”成功,柳鹰雀也脱离了权力体制来到了受活庄。然而阎连科又说:“其实受活庄最后退出体制并不是我开出的药方,离开了现实,归宿最终是虚无的,退回去也是靠不住的。”<sup>[12]</sup>的确,即便成功退出体制,受活庄却也不能完全地回到过去了,它不再不为外人知道,而且受活人也已经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影响。鲁迅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希望在未来,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而沈从文则将眼光投向过去,追寻那些即将消失的美好人性和自在状态。显然,

阎连科认为这两者都不具有可靠性。因而相较于为问题提供解决出路,阎连科更要表达的是自我面对社会改革时的内心的焦虑与困惑,这也体现出阎连科对文学承担的社会功能的疑虑。

阎连科追求乡土创作的个性风格,其作品大都围绕苦难和权力两个主题展开,借此发现独特的乡村真实,表达自我的个性反思。然而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其苦难和权力书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为了突出强调创作意图,有时牺牲了人物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将人变成观念的符号;为了追求极端化的叙事风格,有时会放任个人情绪的宣泄,陷入崇拜苦难的泥沼,等等。另外,较为突出明确的创作主题不仅会限制作品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有时也会使作者落入自我重复的窠臼。这些无疑都限制着阎连科苦难和权力书写的高度。

#### 参考文献:

- [1]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5.
- [2] 潘泽泉. 农民工、身体与社会: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 学习与实践,2008(4):143.
- [3] 张宏. 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2.
- [4] 郜元宝. 从舍身到身受:略谈鲁迅著作中的身体语言[J]. 鲁迅研究月刊,2004(4):19.
- [5]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7.
- [6] 石一龙. 我的小说是我个人的良知:阎连科访谈[N]. 人物周报,2001-11-26(6).
- [7]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
- [8] 阎连科,梁鸿. 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32.
- [9] 时寒冰. 小村的变迁系列之五:权力的天空[J]. 百姓,2004(1):30.
- [10] 阎连科. 阎连科文集·感谢祈祷[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66.
-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1.
- [12] 《北京青年报》编辑部. 有喧嚣才显出寂寞的深:解读阎连科长篇新作《受活》[N]. 北京青年报,2004-02-05(B3).

责任编辑:黄声波